

四個「熱」潮之後？

李澤厚

「美學熱—文化熱—國學熱—西學熱」，二十世紀也就終結了。下面是甚麼或該是甚麼呢？不知道。但是否應該在進一步「吃透」西學的學問基礎上，出現一批從理論到文體都既有現代水平、世界眼光又有中國氣質、中國風貌、富於原創性的思想學說、學術論著呢？這是我所企望於《二十一世紀》和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界的。

記得還是在創刊前，《二十一世紀》便曾向我約稿，以後又有好幾次。忽忽十年，除了幾封短信（刊於「三邊互動」欄）和兩篇短稿外，我沒能提供任何正式的文章，真是慚愧。

日前又收到叫我為十周年紀念寫點甚麼的來信。腹內空空，不知從何說起，只好寫點感想。

載於1994年6月號「三邊互動」欄的拙信中說：「90年代大陸學術時尚之一是思想家淡出，學問家凸顯，王國維、陳寅恪被抬上天，陳獨秀、胡適、魯迅則『退居二線』。這很有意思，顯現出某種思想史的意義，提示的或是人生價值、學術價值究竟何在，及兩者的複雜關係等等問題。」「思想家淡出，學問家凸顯」的說法後來常被人提及，也有人反對，但好像沒人就此進行研究。其實，這是可以結合80、90年代的各種情況從多方面進行探討的一個問題，對了解近二十年來中國大陸思想學術的走向，可能有用處。例如，縱觀文革之後，在大陸思想學術領域，可以看出有四個相繼出現的「熱」潮。這些熱潮的成敗利鈍、作用意義以及與「潮」外「潮」下的關係，等等，便值得思索。當然，這裏只能簡單說說。首先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的「美學熱」，「熱」到工廠也請人講美學，理工科學校也大開美學課，美學書刊佔滿書店好幾個書架，十分突出。其後，是



眾所熟知的80年代中晚期的「文化熱」，提出了被人稱之為「啟蒙」的某些問題。這兩個「熱」究竟是如何可能、如何出現以及有否關連呢？90年代初形勢劇變後，出現了一陣沸沸揚揚的所謂「國學熱」，出版了一大批各式各樣的古笈，以及解說、導讀、研究之類，「現代新儒家」的論著紅火一時，連魯迅、胡適也一概被封為「國學大師」。但結果卻好像曇花一現，終歸沉寂。為甚麼？也值得研究。是不是因為儘管強調「純」學術的偉大意義，儘管高抬王國維、陳寅恪、錢鍾書，但由於並沒有產生學術上的豐碩成果（光提倡國學，出不了這種成果，這種成果也不是能「熱」出來的），即使民間積極，官方支持，這個「熱」也仍然持續不下來？也許，還有更深刻的原因？

最後，就是我願稱之為「西學熱」的90年代中晚期至今。這個時期翻譯出版了可稱為「大量」的西方著作。海耶克 (Friedrich A. von Hayek)，羅爾斯 (John Rawls)、諾齊克 (Robert Nozick)、吉登斯 (Anthony Giddens)、福柯 (Michel Foucault)、哈貝馬斯 (Jürgen Habermas)、華倫斯坦 (Immanuel Wallerstein)、薩依德 (Edward Said)……，後殖民、後解構、後現代、保守主義、自由主義、社群主義、民族主義……以及對它們的各種解讀、闡釋、論說，形形色色，幾乎應有盡有，目不暇給，其引進範圍之廣，品種之多，翻譯之迅速，讀者之普及，都為以前所未見。更不用說現代科技、經濟管理、文學藝術等等了。我以為，這是某種真實意義上的「西學熱」：新一代學人在深入地接受、了解、傳布以至信仰西方現代的各種學理，要求「與國際接軌」。

這個「西學熱」，我以為不僅包括而且更充分表現在當前所謂「自由派」與「新左派」（我曾稱之為「民粹派」，見拙著《波齋新說》）的爭論上。因為兩派一個共同的重要特徵恰好是：都自覺以這些西方現代理論作為申說自己論點的依據或基礎，都引經據典，學問博雅，下筆千萬言，文體亦歐化，讀來雲霧繚繞，神昏目眩。這也許沒甚麼不好，也許正是由「啟蒙」期對西學的朦朧憧憬、一知半解進到全面閱讀、仔細把握的新階段自然會有的表現？

可惜的是，雖然爭論紛紜，作品繁多，但能夠有機結合中國現實或傳統，創造性提出真正屬於自己的意見或看法的，卻似鳳毛麟角，並不多見。常常見到的倒是食而未化，削足適履，拿中國的現實或傳統硬按入西方學說的框框。因此，雖說理盈筐，雖火爆炒作，雖一時顯赫，卻總難使人心服首肯，再讀不厭，產生深遠的社會影響或學術影響。

「美學熱—文化熱—國學熱—西學熱」，二十世紀也就終結了。下面是甚麼或該是甚麼呢？不知道。但是否應該在進一步「吃透」西學的學問基礎上，出現一批從理論到文體都既有現代水平、世界眼光又有中國氣質、中國風貌、富於原創性的思想學說、學術論著呢？

這是我所企望於《二十一世紀》和二十一世紀中國學術界的。

李澤厚 中國大陸學者，現退休。